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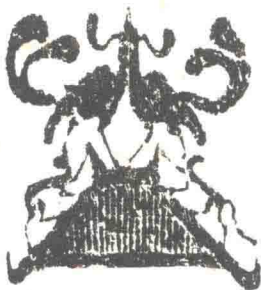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 军 杨富学 主编

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统治者推行较为包容的多元文化政策。畏兀儿人在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汉文史籍、回鹘文献等资料，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畏兀儿各区域不同的文化类型，清晰地反映出畏兀儿文化嬗变的过程。

王红梅 杨富学 著

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俄 军 杨富学 主编

王红梅 杨富学 著



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 / 王红梅, 杨富学
著. — 兰州 :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4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
ISBN 978-7-5423-2961-5

I. ①元… II. ①王… ②杨… III. ①维吾尔族-民
族文化-研究-中国-元代②维吾尔族-文学-研究-中国
-元代 IV. ①K2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2613号

出版人: 吉西平
项目负责: 白鑫
责任编辑: 秦才郎加
封面设计: 徐晋林

元代畏兀儿历史文化与文献研究

王红梅 杨富学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4 字数 278 千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23-2961-5 定价: 48.00 元

总序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走向世界之路。这条古老的商路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却是中华民族得以向全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古代中国文化得以与西方文化实现交流,成为相互影响、融合,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合璧之路。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仅是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互相交往的产物,是东西文明相互撞击的结果,这才是丝绸之路的真正文化价值所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通过丝绸之路,中西文明第一次接触与交流,并在以后的交往进程中共同进步。季羨林先生曾言:“世界上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有四个,即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文化。由于丝绸之路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和吐鲁番是这四大文化体系在全世界仅有的两个交汇点。从人类发展的愿景来看,对文化汇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意义。目前研究这种汇流现象和汇流规律的地区,最好的、最有条件的恐怕就是敦煌和吐鲁番。”

敦煌、吐鲁番作为四大文明汇聚之地的代表,毋庸置疑。除此之外,长安、于阗、龟兹、楼兰、张掖、武威、天水、西宁、固原等

地也都莫不以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而著称于世。穿越西北的丝绸之路不仅是重要商道,也是文化交流的通道。甘肃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唯一不变的交通干道,也是丝绸之路历史遗存最典型、最丰富的地区。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河陇地区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之地,更是多种文化交融荟萃的枢纽。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吐鲁番文书与石窟、居延汉简与悬泉汉简、黑水城文献、藏文文献等大量古代的文化遗存的相继发现都令世界震撼。丝路文化也逐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中最为耀眼的部分,以致对其研究成为东方学诸多学科领域内最为突出的内容之一。

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是甘肃这块贫瘠的土地所孕育出的灿烂杰作,是甘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甘肃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汇的要道和各民族交融的前沿地带,必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如今随着考古及文献的不断发掘,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于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产生着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外学者的努力耕耘下,获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截止目前,有关敦煌与丝绸之路文化方面出版的图书数以千计,而且研究范围正日益扩大,每一时段都会有新的学术成果涌现。

甘肃学术资源丰富,然而就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而言,无疑应首推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三者可并称为拉动甘肃学术研究走向世界的“三驾马车”。甘肃教育出版社

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立足本地,传承文化,追求特色,出版精品”的原则和方针,先后推出了大量优秀的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推重。这套“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的策划与出版,正是该社突出“敦煌文化”与“丝路研究”主导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些选题又都和丝路沿线纷繁复杂的民族历史文化问题息息相关。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文丛”是一套综合性学术研究丛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丝绸之路沿线历史、宗教、语言、艺术等文化遗存。和以往的有关丝绸之路文化方面的论著相比,本套丛书有自身个性,即特别注重西北少数民族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在充分掌握大量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内容的选取和研究成果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前沿性。整套丛书也力求创新,注重学科的多样性和延续性,其中的各分册图书,在该学术研究领域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当然,这12册图书只是国内敦煌与丝路文化的部分成果,我们今后还将进一步通过出版续编的方式逐步完善,竭诚欢迎各位同仁的参与、批评与指正。

文丛的作者,既有成就卓著的老专家,也有青年才俊,更多的则是在这一领域有着突出成就的中年学术骨干。本丛书从策划到编辑,得到了诸位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从完善书稿到认真校对,都付出了不少辛劳,从而保证了书稿的写作质量和出版质量,在此致以由衷的感谢。

此外,不少年轻人,如甘肃省博物馆的赵天英,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的彭晓静、王东、张海娟,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李志鹏以及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的研究员俄玉楠、史淑琴、阿尔斯兰、史亚军等都参与了本丛书的具体工作,孜孜矻矻,乐此不疲,保证了丛书编纂工作的顺利完成,这里致以深深的谢意。

俄军 杨富学

2014年元旦

前言

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其疆域之辽阔,少数民族之众多,语言文字之纷繁,文化形态之复杂,东西方宗教之兴盛,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先例。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蒙元统治者实行较之前代更为包容的多元文化政策,采取多种语言文字并行的政策,推行各教并举的多元宗教政策。这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历史空间,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奉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大蒙古国)。此后,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不断地西征南讨,开疆辟土,征服四方,先后灭西辽、西夏、金,招降吐蕃,攻占大理。1276年灭南宋,1279年消灭其残余势力,最终统一全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今新疆、西藏、云南、东北等地,都被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远超前朝。在《元史·地理志》中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1259年,蒙哥汗去世。1260年,忽必烈在漠南开平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继承汗位;同时,阿里不哥亦在哈拉和林即汗位。1264年,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成为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者。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由于他推行“附会汉法”的政策,遭到其他几位蒙古汗王的反对,导致蒙古汗国的分裂。蒙古汗国事实上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四大汗国名义上服从大汗宗主国,政治上却各自为政。史学界对于元代的起始年代虽有不同的观点,但都认为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被各宗藩奉为宗主。^①元朝是蒙古汗国的继承与发展,并非改朝换代,也是四大汗国的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举措上亦多有保留。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元代,不仅仅局限于元朝的历史,而是包含了蒙古国与元朝,即自1206年伊始,延续至1368年。本书将对这段历史时期畏兀儿的文化类型、宗教信仰、儒学发展以及佛教文献等做系统的论述。

畏兀儿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外

^①陈得芝:《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页。

来文化的民族。他们曾先后信仰过萨满教、摩尼教、佛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最后才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受到周边民族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曾使用了古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婆罗米文、汉文及阿拉伯文等多种文字。他们用这些文字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

蒙元时代,回鹘常被译作“畏兀儿”,有时又译作“瑰古”、“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不同的译名。^①回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译名亦有所不同,南北朝时译作“袁纥”,隋时译作“韦纥”,唐时称“回纥”、后改称为“回鹘”,即“回旋矫健如鹘鸟”之义,这些均为回鹘语“Uighur”一词的不同音译。在本书中,为了便于叙述,涉及元代时称之为“畏兀儿”,在论及唐代时则称之为“回鹘”。

蒙古国初期,畏兀儿首领亦都护最早主动归附,受到了成吉思汗的奖掖与优遇。1209年春,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杀死了西辽派来的少监等官,脱离了西辽的统治,转而归附蒙古。1211年,巴而术携贡物至漠北朝觐,成吉思汗以女也立合敦嫁之,让他继续担任高昌“亦都护”。他对上须履行纳质、纳贡、从征等藩国义务,但对自己的领地和属民,则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②

至元九年(1272年),窝阔台嫡孙海都扶植都哇为察合台汗,联合反对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都哇等领兵12万包围火州,随着西北藩王的兵锋不断东进,火赤哈儿的斤退至哈密,再次遭到海都、都哇军队的突然袭击,力战而死。余部护佑其子纽林的斤东迁入关,并建幕府于甘肃永昌(今武威市北郊约30里处的永昌堡)。^③此后,历代亦都护以永昌为“治所”,遥领原高昌王国境内的畏兀儿人民。至元二十年(1283年),元朝设立别失八里行尚书省(省治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及宣慰司,统辖天山以北地区;天山以南地区则由和州(火州)宣慰司统辖。有元一代,高昌回鹘一直享有特殊的半独立地位。

自成吉思汗伊始,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就保持着亲密的婚姻关系,并一直延续到元顺帝期间。先后有七代亦都护与蒙古公主和亲,有九位蒙古公主嫁给亦都护,纽林的斤一人就娶了三位公主。^④嫁给亦都护的蒙古公主都是蒙古黄金家族的直系公主,其中有窝阔台的亲生女

①王日蔚:《维吾尔(缠回)民族名称演变考》,《禹贡》第7卷第4期,1937年,第443~461页。

②尚衍斌:《试论元朝中央政府对畏兀儿地区的统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第30页。

③贾从江:《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第17~18页。

④王红梅:《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家族联姻考》,《兰州学刊》2009年第6期,第11页。

儿阿剌真公主、贵由之女巴巴哈儿公主,还有窝阔台的孙女不鲁罕与八卜叉姐妹等。由于蒙古黄金家族与亦都护家族的联姻关系,畏兀儿人在元朝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成为蒙古黄金家族的驸马,纽林的斤被册封为“高昌王”,其后裔也一直世袭“高昌王”的封号与爵位。帖木儿补化官至中书左丞相,位极人臣,其子不答失里也曾任中书平章政事等官职。亦都护家族与蒙古王室长期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这使得畏兀儿人成为蒙古统治者重要的军事、政治盟友。这不仅有力地维护了西域局势的稳定,为元朝的统一、边疆的开发、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也提高了畏兀儿人的政治地位,为其文化发展、经济繁荣开辟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蒙古族早期以游牧为生,素无文字,刻木为契。成吉思汗时,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母为基础,创造了蒙古畏兀儿字来拼写蒙古语。回鹘文作为官方文字在元朝境内广泛使用,这为畏兀儿人的入仕提供了便利的语言优势。在蒙古朝廷中担任王傅、必闾赤、翰林学士等文职者极多。著名元代文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提道:“然今高昌之人,内侍禁近,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而其人亦多贵且贤。”^①可见畏兀儿人深得蒙古王室的信任。据统计,在中书省任职的畏兀儿人多达31人次^②,在行中书省任职的畏兀儿人达61人次之多^③。在突厥诸族中,回鹘人力量最为强大,史书记载的元朝各级官员中,皇宫中的顾问、秘书、地方官员或法官有469位是回鹘人^④。许多畏兀儿人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各级官职,成为辅佐元朝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元代是畏兀儿文化发展达到鼎盛的时期。然而,在汉文史籍中对畏兀儿的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记载较为零散简略。在《元史·释老传》中仅记载了畏兀儿替僧、曾任国师的必兰纳识理,但其传记写得过于简短,对其参与谋反之案更是语焉不详,难以了解真相。在《佛祖历代通载》中也仅收录了畏兀儿女僧舍蓝蓝的传记。然而,其他众多畏兀儿人的事迹即使汉文史籍有所记录,也十分零散,难以为后人所了解。幸运的是,近代大量回鹘文

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四《太宗正府也可札鲁火赤高昌王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②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94~200页。

③尚衍斌:《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201~207页。

④拉合威茨:《蒙古统治中国时期的突厥人——十三至十四世纪突厥—蒙古关系初探》(*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罗萨比编:《十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及其周边》,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83年,第285页。

文献的出土与解读,解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让人们对于畏兀儿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信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近百年来,在西域、敦煌等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回鹘文文献,其中,仅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就有八千余件,绝大多数都属佛教内容。要知道这只是伊斯兰教传入之后,劫后余存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想象佛教当年在高昌回鹘王国繁荣昌盛的情况。^①从现已刊布的文献看,回鹘文宗教典籍以佛教文献为最多,占据了绝大部分,回鹘人纵然不是将全部《大藏经》,至少也是将《大藏经》中的经、论两部分的主要著作都译成了回鹘文。

回鹘文文献的出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德国、俄国、法国、日本、土耳其以及我国的学者纷纷加入文献的解读、研究之中,为回鹘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近年来,有关回鹘文文献的论著层出不穷,成果众多,但大多皆局限于文献的整理刊布与语言学研究上,而利用这些文献来系统地论述元代畏兀儿文化的著作并不多见。有关回鹘文化研究的著作,国外著名的有德国学者葛玛丽(A. von Gabain)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Das Leben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850—1250)》、德国学者茨默(P. Zieme)的《佛教与回鹘社会(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法国学者路易·巴赞(Louis Bazin)的《突厥历法研究(Les Systeme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等;国内主要有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与文献概论》、《新疆文史论集》,史金波与雅森·吾守尔合著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牛汝极的《维吾尔古文字与古文献导论》,杨富学的《回鹘文献与文化》以及尚衍斌的《元代畏兀儿研究》等。这些著作侧重于研究回鹘佛教文化、印刷术、政治经济的某些方面,然而,对于蒙元时期的畏兀儿文化尚未见到系统的论述。因此,笔者在吸收前贤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蒙元时期畏兀儿的历史文化以及密宗文献进行了较为深入而详细的研究。

目 录

第一章 元代畏兀儿的界定及其文化区域	(1)
第一节 元代畏兀儿的界定	(1)
第二节 以喀什为中心的文化区	(7)
第三节 以高昌为中心的文化区	(10)
第四节 内迁畏兀儿文化区	(14)
第二章 畏兀儿与汉传佛教	(19)
第一节 概述	(19)
第二节 汉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传播	(20)
第三节 元代畏兀儿与禅宗、天台宗	(26)
第四节 畏兀儿的五台山信仰与文殊崇拜	(32)
第五节 汉传佛教对畏兀儿的影响	(38)
第三章 畏兀儿与藏传佛教	(47)
第一节 畏兀儿与藏传佛教的接触	(47)
第二节 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流行	(51)
第三节 著名畏兀儿翻译家	(57)
第四节 回鹘文献中的藏密经典	(79)
第五节 藏传佛教对畏兀儿的影响	(85)
第四章 元代畏兀儿的儒学	(97)
第一节 元代儒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97)
第二节 儒学在畏兀儿中的传播	(100)
第三节 畏兀儿儒士与元代政治	(103)
第四节 畏兀儿仕宦的贡献	(105)
第五章 元代高昌回鹘的语言	(109)
第一节 概述	(109)
第二节 语音系统的演变	(111)

第三节	语法系统的完善	(118)
第四节	词汇的发展	(123)
第六章	回鹘文写本《吉祥胜乐轮曼陀罗》研究	(127)
第一节	文献概述	(127)
第二节	原文转写	(129)
第三节	汉译文	(143)
第四节	疏注	(149)
第五节	藏密十六佛母考	(158)
第七章	回鹘文写本《身轮因明经》研究	(165)
第一节	文献概述	(165)
第二节	原文转写	(167)
第三节	汉译文	(183)
第四节	疏注	(190)
第五节	十六金刚天女考	(195)
第六节	转轮王“七宝”考	(198)
第八章	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	(203)
第一节	概述	(203)
第二节	回鹘文写本的发现	(205)
第三节	写本中的回鹘文题记	(209)
第四节	写本中的蒙古文题记	(212)
第九章	敦煌莫高窟464窟回鹘文榜题研究	(217)
附录		(225)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9)

第一章 元代畏兀儿的界定及其文化区域

畏兀儿,是元代(包括蒙古国至元代,1206—1368年)汉人对今天维吾尔族、裕固族祖先的称谓,又写作“畏兀”、“辉和尔”、“瑰古”、“伟吾尔”等,如同唐宋时代汉文史书所谓的回鹘一样,均为回鹘语 Uighur 的不同音译。

畏兀儿本为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之一,于8世纪中叶,曾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了雄强一时的草原大帝国——漠北回鹘汗国。9世纪中叶,由于天灾人祸的夹击,汗国崩溃,部众遂迁往西域、中亚及河西走廊一带,分别建立了高昌回鹘汗国、喀喇汗王朝及甘州回鹘、沙州回鹘等民族政权。后二者因局促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对今天维吾尔族文化的发展影响不大,故而从略。

第一节 元代畏兀儿的界定

元代汉文史籍所称的畏兀儿人指的是哪些人呢?学界长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畏兀儿人仅指高昌回鹘人的后裔,而不包括喀喇汗王朝主体居民的后代。^①也就是说,只有聚居于五城,即哈喇火州(亦作哈刺和卓,又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别失八里(又称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昌八里(今新疆昌吉市)、仰吉八里(今新疆玛纳斯县)和焉耆一带的族人;而分布在哈密力(今新疆哈密市)、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南疆等地的族人则不属于畏兀儿人。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畏兀儿人不仅分布于高昌一带,也分散在其他地区。^②两种说法各有其道理,但都失之偏颇。前者强调的是畏兀儿亦都护所管辖的范围,但忽视了亦都护政权外其他地区畏兀儿人的分布;后者强调的是畏兀儿人的分布区域,而忽视了史书上所谓畏兀儿一般指代畏兀儿亦都护政权这一

①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4~294页;田卫疆:《论元代畏兀儿人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216~227页。

②杨志玖:《萨都刺的族别及其相关问题》,《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4页;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

史实。笔者试就这一问题略述己见。

元代民族问题比较复杂,但时人的民族知识不够丰富,民族概念也较为模糊,将民族、政权、信徒之名称混为一谈是常见之事。有些概念虽然名称相同,但实质内涵却不尽相同。元人在述及西域、中亚民族时,常用“畏兀儿”、“回纥”、“回回”等称谓。此时,高昌回鹘汗国境内的族人大多信仰佛教,被称为“畏兀儿”。然而,原喀喇汗王朝境内的族人因皈依了伊斯兰教而被称为“回回”或“回纥”。因此,元代畏兀儿人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两个民族,冠以不同的称呼。这反映出蒙古人最初是从文化的属性出发对西域诸民族进行区分的。

宋辽之际,“回回”为“回鹘”、“回纥”之音转误读,也常常被混用。成吉思汗时期,“回纥”与“回回”虽略有区分,但并不明确,时常混用。近代学者认为金元之际汉文史籍中的“回纥”指的是穆斯林,其实并非完全如此。

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曾邀丘处机西行觐见。丘处机遂撰《长春真人西游记》两卷以记录沿途所闻所见。据笔者统计,在上卷中,“回纥”出现18处,“畏兀儿”、“铺速满”、“迭屑”各出现1处。文中的“回纥”有时指穆斯林,有时又指畏兀儿佛教徒。

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上卷中,至少有3处“回纥”应指信奉佛教的畏兀儿人,即

抵阴山(今天山博格达峰)后,回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郊迎,至小城北,酋长设葡萄酒及名果、大饼、浑葱,裂波斯布人一尺。

西即整思马大城(即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时回纥王部族供葡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

又历二城,重九日至回纥昌八刺城(今新疆昌吉市)。其王畏兀儿与镇海有旧,率众部族及回纥僧,皆远迎……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①

上文所述地区,均在别失八里和昌八里一带,是畏兀儿人较为集中的地方,盛行佛教,同时兼有道、儒并行。可见,这四处“回纥”均指信奉佛教

的畏兀儿人。当时,昌八刺城是佛教与伊斯兰教的分界线,以东僧侣居多,“西去无僧,回纥但礼西方耳。”^①这里的“回纥”则指皈依了伊斯兰教的穆斯林。需要指出的是,书中误将“畏午儿”当作回鹘王之名来处理,显然也是民族知识缺乏所致。

在该书下卷中,“回纥”出现5处,其中有两处指的是文字,即“回纥字”:

车舟农器制度,颇异中原……市用金钱无轮孔,两面凿回纥字。

上悦,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敕左右记之以回纥字。^②

至于这里的“回纥字”指的是回鹘文还是阿拉伯字,有待进一步考证。

此后,刘祁所撰《北使记》,似乎对“回纥”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据笔者统计,“回纥”共出现10处,“瑰古”、“回鹘”各出现1处。“瑰古”、“回鹘”即指畏兀儿,而“回纥”似乎指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对此,学界已有专论,^③这里不再赘述。

元代“回回”概念所涉及的民族亦很宽泛,不仅包括原阿拉伯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也包括中亚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西辽故地的其他突厥人,还有来自非洲的“黑回回”等。蒙古统治者将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人称为“回回”,但有时亦将非穆斯林冠以“回回”之称,如称犹太教教徒为“术忽回回”,称来自叙利亚的基督教教徒为“爱薛回回”,称信仰东正教的阿速人为“绿眼回回”。因此,“回回”并不等同于穆斯林。^④

由于汉文史籍记载之混杂,在研究畏兀儿人的具体分布及其文化时,不能局限于汉文史籍的记载,而应结合近代出土的考古资料与回鹘文文献,并应用民族学的基本原理,来深入考察其真实内涵。

众所周知,近代民族学界对民族进行界定时,仍依据斯大林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该定义不

①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

②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9~222页。

③黄时鉴:《释〈北使记〉所载的“回纥国”及其种类》,《中国史论集》(祝贺杨志玖教授八十寿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93~303页。

④尚衍斌:《元代色目人史事杂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第93页。

⑤《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4页。

仅适用于现代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古代民族。在判断元代西域民族时,也可根据这四个标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民族心理来辨别其族属。

元代的哈密,有人认为不属于畏兀儿,应是一个与畏兀儿地面并存的封建地方政权。^①如果仅以政权(即所谓的“地面”)来观察,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哈密居民,应该说是以畏兀儿人为主的。元明汉文史籍中对哈密的记载较少,但是近代哈密的考古发现可以提供更真实、更具说服力的佐证。1959年在哈密县天山公社发现了大型回鹘文佛经《弥勒会见记》残卷。其回鹘文文本应译自吐火罗语,译经年代约在9、10世纪。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保存较为完整,字体为工整的写经体。^②哈密市五堡乡四堡村北还有恰普禅室,内存少量壁画,从艺术风格来判断,应属于高昌回鹘时代之遗物。^③可见,哈密在唐末已成为回鹘佛教的一个中心。

有元一代,哈密的畏兀儿文化昌盛,人才辈出。著名畏兀儿大臣塔本,就是伊吾庐(即今新疆哈密)人。塔本世居伊吾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臣民。其父是高昌国王所封的“沱沱”,意即“国老”。塔本与布鲁海涯一同追随高昌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跟从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元代著名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也是感木鲁国(即哈密)人,他奉旨跟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元成宗出家,受封为“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并翻译佛经五、六种。还有在敦煌出土的元代回鹘文藏密佛经《吉祥轮律仪》残卷,回鹘文译者即为哈密人。该抄本第46页载:“哈密尊者阿闍黎(Ārya Ācārī)遵佟巴(Istongpa)大师之令翻译。”^④此外,西北藩王都哇叛军攻下火州时,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带领回鹘民众逃到哈密,屯兵驻守于此。《马可·波罗行纪》也记载哈密“居民皆是偶像教徒,自有其语言”。^⑤可证当时哈密畏兀儿人数量当不在少数,我们不能囿于政权名称和界域来观察当地的民族属性问题。

南部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居民的族属问题始终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元明汉文史籍在叙述西域少数民族时,常以地名称谓族人,以籍贯

①陈高华:《元代新疆史事杂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6页。

②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③《哈密文物志》编纂组编:《哈密文物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4-86页。

④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109)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6卷,1974年,第44页。

⑤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第118页。